

现代社会学中的意象结构

顾 辉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 要: 古典社会学社会结构理论中只包含制度结构、关系结构。现代社会学在克服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二元对立中, 发展出惯习意象结构, 把建构社会结构的基础引到人类知识和身体存在的本体论深度, 这是对学术分类体系的超越, 使社会结构从宏观的、客观的和结构的制约性的走向与微观的、主观的和能动性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 现代社会学; 制度结构; 关系结构; 意象结构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730(2009)10-0005-05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理论和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 它构成社会学研究核心命题“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学科谱系两端, 即“结构”和“行动”中的一极, 也是试图消解这种社会科学研究中二元分裂必须得以阐释的问题。在社会科学及其相关的学科中, 社会结构是个应用广泛但又争论较多的一个概念。将社会结构看作是一个社会中各个元素之间相对持久的模式或者安排, 这是较为普遍的观点。沃特斯(Waters, M.)认为, 社会结构是指在直接感受到的经验之下潜藏的各种社会安排所体现出来的模式^{[1]13}。但是, 对于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 或者行动体现出来的模式到底有哪些, 这些定义并没有告诉我们。

英国社会学家杰西·佩洛兹(Jose Lopez)和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社会结构概念的历史及其类型^{[2]4}。他们指出, 社会学的历史显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概念的长期共存。一方面是制度结构。在制度结构里, 社会结构被看作是由那些定义为人们行为期望的文化或规范模式所组成, 通过这些期望, 行动者能把握彼此的行为并且组织起相互持久的关系。另一方面被视之为关系结构, 在这种观念中, 社会结构被看作是由社会关系自身所组成, 也就是被理解为行动者和他们的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独立性以及他们所占据的模式。但是, 对这两种社会

结构的理论区分并没有消弥社会学中长期存在的“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 社会结构仍然没有摆脱关于社会和社会体系的宏大叙事, 参与社会结构中的个体行动者仍然是不可见的。针对这一情况, 后结构主义展开了对社会结构的重新解读。福柯通过对知识的考察揭示了构成时代话语规则的内在结构——权力关系; 布尔迪厄将社会结构纳入他对行动的理解并构建了新的概念——惯习, 通过这个概念, 行动和结构都得以再现并融为一体。在这种消解对立与融合过程中, 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完善其概念体系。在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之外, 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类型——意象结构被提出来。

一、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

社会学创立早期, 社会结构被视为实体性的并且对社会结构概念的建构基本依赖对生物学的移植。斯宾塞(Spencer, H.)就将社会结构比作人躯体中的各个器官, 每个部分承担着一定的功能。对应于生物有机体, 社会系统也可以分化为由“支持”、“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组成的结构, 社会系统之间的组织模式是由带有整合期望的组织系统统一调节并能够保持协调运行的。

此后涂尔干(Durkheim, E.)将斯宾塞的社会结构观念发挥得更加彻底。他将社会现象视为社

* 收稿日期: 2008-12-08

作者简介: 顾辉, 男, 安徽蚌埠人,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会事实,认为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非个人意愿能左右并对个人具有制约性,人们的思想结构反映着社会结构的秩序,而且在反映的过程中加强和再现了这些秩序。在涂尔干这里,社会结构既包括了制度结构,也包括了关系结构的源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由集体关系和集体表征的特殊联合以及连接物和规则的形式组成。这种集体关系和表征集中表现在关于社会团结的两种形式上,即简单未开化社会的机械团结和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那种以低度分工为基础,以强烈集体意识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关系整合形式,他称之为“机械团结”类型。另一种以高度分工和广泛的相互依赖为基础构成的社会关系整合形式,属于“有机团结”类型^{[3]16-19}。在这里,涂尔干把社会结构看作社会关系的组合形式,而且他认为,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

帕森斯(Parsons, T.)将社会结构视为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系统,包含执行“目的达成”、“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的完整体系。这个完整体系被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对应四项基本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护功能。帕森斯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系统,结构内的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作用;同时,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维持整体的动态的均衡秩序^{[1]119}。这样,结构就表现为一种功能。但是帕森斯非常强调秩序,他明确地将秩序作为结构的本质,并认为结构由行动者在情景中彼此的互动而组成。在这里,帕森斯又将结构视为一种互动关系模式。为解释这一关系模式,帕森斯用地位—角色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并将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体系单位。“地位”为行动者所处的结构位置,“角色”表达社会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望,它是社会与个人联系的中介,又是众人分享的象征。这样一来,行动者的互动就成了一连串具有地位—角色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而互动中的个人不管怎样变化,角色互动作为社会模式化的准则是相对稳定的,而社会结构,就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模式化了的成分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在帕森斯这里,社会结构成为了一整套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它已经作为一种概念化的实在,其核心要素就是文化促成的期望,即社会制

度。正是通过社会制度,实践才变得合乎社会规范,行动才得以被指导和控制。对于行动者而言,制度是引导其行动的“行动地图”。

这种对制度结构的广泛理解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探究,他们着眼于资本主义合法化前提下由文化所扮演的角色。葛兰西(Gramsci, A.)的“文化霸权”理论就提供了关于制度结构的论调。他认为,国家社会和其他社会的全体应该被看作是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全体,这些社会关系是由阶级暴力的明确和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形成的。葛兰西主张,阶级不能只是通过权威压制来取得统治,还需要一种文化权力,即文化霸权,通过文化权力才使得占支配地位的积极意义上的同意能够得到保护。文化制度形成一种世界观,或者说是“常识”世界,这就组织和安排了个人的行为。葛兰西相信,这种制度常识在学校、教堂、工会和其他一些组织的日常活动中被不断地再生和复制。

在关系结构理论的发展脉络中,齐美尔(Simmel, G.)最先旗帜鲜明地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视为人际互动的关系形式。他认为,社会学的目标就是对于这种抽象化的社会生活纯粹形式的描述和分析,因此他的社会学理论被称为“交往形式理论”。齐美尔提出了这个目标却没有提供如人们期望的有关社会形式的系统分类,但他富有洞见地分析了社会交往形式的几种典型的印象风格。齐美尔指出,社会交往过程由行动相互盘绕或多或少的复杂模式组成,这些行动互相影响,互相依赖,并组成更大的关系形式。社会结构就是这些较为简单的社会关系的“结晶体”,大规模的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较小的面对面互动基础上的相互作用。齐美尔的关系思想对韦伯等后来的学者产生重大的影响,韦伯(Max Weber)在考察社会冲突、竞争以及社会选择时,更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关系的开放或封闭、公共或理性程度。韦伯使用社会关系的这些一般特征建立了诸如家庭、市场、财产、阶级、教会和国家等概念,而他所谓的社会结构,也被看作在这些社会关系中特定个体之间产生的连接而出现的。同样的,腾尼斯(Tönnies, F.)探究了“共同体”(community)和“社会”(society)两种社会关系形式,以及它们如何能够连接成为扩大的团体、族群或更大的社会关系的圈子,相应地,它们可能形成不同类型的结构类型或者实体^{[2]78}。社会结构的这些关系主义倾向

被后来的社会冲突理论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没有直接论述社会结构,但他更为强调根源于物质的生产关系,亦即人们在自给的生活和社会生产关系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82}。由此可见,马克思将“结构”看作“关系总和”,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整体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在社会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而在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显然,在马克思的观念中,结构不仅可以指客观实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人为实体(如制度、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等)之间的逻辑关系^[5]。

社会关系形式的社会结构研究随着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布劳(Blau P. M.)认为,任何有形的社会结构都可以定义为某种形式的“参数”,这些参数是产生特殊类型社会关系原因的组织规则。一个社会的结构就是人口被分类为不同社会地位的多维空间^{[6]353},而结构参数使我们探究这个空间以及不同结构位置上的个体行动成为可能。随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向社会学的渗透,社会结构研究发展出运用日益复杂巧妙的数学方式来探究社会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用社会关系网络图中的点和线来描绘社会行动的动因及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图中,线与线之间的关系模式描述了一个社会或社会团体的关系结构,对社会关系结构图的数学分析产生关于这个社会关系结构的信息。米切尔(Mitchell W. J.)开创社会网络测量分析的符号数学方法,怀特(White H. C.)等人后来又提出了“块模型”等概念,格兰诺维特(Granoveter M.)的弱关系假设以及博特(Bott E.)的结构洞理论都使得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范式分析社会关系结构得到了广泛应用。

二、现代社会学中意象结构理论的提出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制度层面还是关系层面,社会结构都无法达到对社会行动模式深层机制的挖掘。列维-斯特劳斯对社会“深层结构”或曰“心灵结构”的分析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秩序安排提供了必要的线索。

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看来,所谓结构是那种决定历史、社会与文化中的诸具体事件和行为基本的规则整体。如果结构确有“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分的话,那么,这种规则整体显然意指“深层结构”,即与语言行为相对的语法结构,与社会行为相对的经济基础的结构,以及与意识活动相对的无意识机制等。其次,结构也指现象的表面秩序,是基本精神过程的表层显现。诸表面秩序,即可观察、可分析归纳的诸社会现象的秩序,是各种表层结构,能反映决定着它们的深层结构,深层结构决定表面秩序。我们可以看出,斯特劳斯的结构是深层结构中的规则总体,结构是隐藏着的逻辑关系。因此我们说,规则性结构、关系性结构正是斯特劳斯为读者所形塑的结构^[5]。尽管这种结构已经从表面走入了深处,但是,斯特劳斯仍然没有解决社会结构理论中本身包含的行动与结构之二元对立。在斯特劳斯看来,源于人类心理“无意识”的深层结构具有决定性地安排着客观世界的表层秩序,而且,这种心理结构与社会世界的客观结构存在较为严格的对应关系。社会结构在斯特劳斯那里被生硬地割裂开来。

为了跨出社会结构理论中长期存在的客观与主观、行动与结构、制约性与能动性的两极化思维,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A. Giddens)、福柯(M. Foucault)、布尔迪厄(P. Bourdieu)开展了理论综合的尝试。吉登斯发展了称之为“结构化”的理论。他认为,社会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7]52},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是行动的内在因素,是潜在的、非具决定性质的情境界域。行动者“具有知识”,这种知识是反思性的。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会构成“相互知识”——成为行动的内在因素。行动者在知识上的不完美,将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正是“意外后果”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迁。此外,规则也并非像游戏规则那样,是与某一举动一一对应的关系,相反,它是一系列相互连接、彼此交错的规则群,它是同社会的实践活动相联系而存在的。

吉登斯反复强调了实践在规则和资源运作中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离开实践,规则和资源都成了不能自我运作的抽象体。结构在实践中才有动力,才有灵活性。正是在实践中结构获得了某

种灵活性或能动性,由此,吉登斯将其“结构二重性”观点总结为: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他认为,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不像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决定论认为的那样,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也不像解释社会学和现象社会学所宣称的那样,人的行动如何构成社会,而是行动是怎样在日常的生存条件下被结构化的,与此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怎样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即人具有其能动性的同时也受着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

话语结构一直是福柯研究的主题之一,但是福柯对话语的研究更关注话语的对话性,强调话语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是一种活动,首先是书写活动,其次是阅读活动,最后是交换活动。在他看来,话语只有在人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在书写和阅读中展开,而且具有交换、交流或交往的性质。福柯之所以重视话语的交流性,在于他透过话语分析,揭示了隐藏在其后的深层结构——权力关系: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是依据一定数量的步骤而被控制、被选择、被组织和重新传播的,这些步骤的作用在于转移力。

福柯在这里指出了—个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事实,那就是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象力的结果,也不是自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藏的手段,来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这种知识构成了认知范型的制约,换句话说,认知范型实际上是制约着一个时代的知识和认识方式的那些结构。认知范型最终会将规则转化为一种对真理和知识的意志及欲望的追求,以所谓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假象掩盖权力的作用^[5]。可见,福柯将社会结构本质视为一种权力的关系结构,权力透过知识的真理观来实施。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已经表明,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的基础是在于人们基于利用可用的知识所做出的境况的反应。知识并不是有分立的一组“事实”和“观念”组成,它是建构行动的身体秉性和产生规范控制的社会行动的实践能力。这样,在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之外,社会结构又增加了另一种本体论深度的测量,它铭刻在人类身体和他们思考、感觉及行为的方式上,是一种身体化的社会结构,通过这种

我们称之为的“意象结构”,身体和身体的存在成为社会结构生产、再生产和转换的中心。制度和关系的虚拟秩序就“具体化”在人类组织中,这些组织的行为就使我们推断它们的存在成为可能^{[2]132}。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正为实现社会结构的这一类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惯习作为一种意象结构

布尔迪厄认为,惯习由过去的经验综合起来的可持续、可转换的倾向系统,所指的不是个体性的、技能性的熟练习惯,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持久的、规则行为的生成机制。它是一整套的性情系统,它首先是指起构造作用的行为结果,即一种身体化的结构,它还指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习惯状态,特别是指一种趋向、倾向、素质、偏好。因此,在布尔迪厄这里,惯习包含有结构和倾向两层意思。可见,布尔迪厄是从社会力量与身体禀赋系统的惯习中发展了结构的观念。他通过身体化的性情倾向,使得某个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得以形成合为一体的结构图像。惯习是一个持久的、可以转换的性情系统,这些性情系统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客观生成图式。在不同场域交叉出现的行动和在其制度与关系结构中显而易见的行动的相似性,是风格亲密的关系的结构,这起因于人们日常生活中面对的许多新奇情形的某些持久计划的应用。因此,组织社会生活既包含个体的战略意图,更包含了个体意志之外的结构再生产。

从惯习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惯习融合了社会科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它超越了社会结构的制度模式和关系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同行动的主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结合起来,它是一种内化为主体身体内的社会结构的制度模式和关系模式。社会结构的制度和关系的模式产生于这些被赋予能力和技能的个体行动,这些技能和能力使得个体能通过一种组织起来的行动而产生这些模式,这种社会结构被称为意象结构(embodied structure)^{[2]16},它是社会结构概念中继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之后的—个重要的社会结构类型。

意象结构是从铭刻于人类身体和思维中的习惯和技能中发现的,这些技能和习惯使人们生产、再生产和改变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意象结构是一种身体化的结构图像,是隐含于行动的结构意

象,是客观结构在身体中的再造。但是,意象结构是一种结构存在,它通过无意识和“误识”来指导和重塑结构,因此,它同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一样是现实可感知的结构模式。意象结构说明个体行动者对现实结构具有能动的感知,它是一种结构的主观建构,是主观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的美学范畴。意,指心意;象,指物象。意象即对象的感性形象与自己的心意状态融合而成的蕴于胸中的具体形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将其用于艺术创造,指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说明构思时须将外物形象与意趣、情感融合起来,以形成审美意象。而结构意象正是形成于“胸”的形象。发展出“结构意象”这一概念,是为了突出强调惯习形成过程中,个体行动者能动性的重要性。

社会结构的客观事实经过行动者能动性的过滤,在思维中形成了一个自己对社会结构的解读,因此在行动者主观意识中的社会结构是经过改造的结构,这种改造是与行动者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和掌握的资本相关的,但是这种客观社会结构的“意象”总能与行动者的行动联系起来,因为意象结构才是行动者行动的真正指南。行动者是在自身对社会结构的解读下开始行动的,尽管意象结构与客观的社会结构存在或大或小的距离,甚至是颠倒的结构图景,但社会结构必须经过行动者的主观改造之后才能内化到行动者的行动中去。意象结构与现实结构之间的距离与行动者在社会空间的位置,即行动者掌握的资源有关,行动者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越是丰富,其对社会结构的把握就越可能接近现实,其意象结构与现实结构的距离也就越小。

以此理解,惯习就是意象结构。首先,惯习来自于历史的“前结构”,它是行动者历史经验沉淀并内化为心态结构的禀赋系统,它同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行动者的社会结构位置在历史经验中内化的产物。在现实中,惯习以某种密码化和译码化的双重程序完成历史同当前行动条件的交叉转换,其行动过程和行动模式,受制于现实的社会结构位置并同前结构位置调和。其次,惯习不是结构被动的存在,它既包括了行动者行动历史环境中组织构架,也包含了一系列的文化期望。它既是关于行动的一整套“游戏规则”,也明确为特定地位上的角色期待。结构借其路径

从历史中沿袭、改造与传递,从而使现实实践中的结构和行动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结构的烙印。但是,前结构并不是机械地反映在行动者的实践中,结构的客观性经过行动者的主观改造才能发挥它的影响力。在惯习中,行动者不是结构被动的“黑箱”,他总是在自己对结构的理解中生成惯习,并在与客观结果的互动中不断改变对结构的理解。

四、“意象结构”理论的意义

制度结构、关系结构和意象结构的提出是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深化。制度结构将人类的社会生活引导到文化和规范制度当中,视社会结构为相对稳定、模式化了的规范体系,但是制度分析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它强调行动在结构中的被动性和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将社会关系假定为可以通过一致同意和社会化而完美制度化。关系结构复活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赋予了人类行动以目的和意义,通过社会空间的关系网络将社会结构实体与社会意义系统联结起来,从而为我们揭示了掩盖于社会生活下面的“深层结构”。尽管关系结构拉近了社会结构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但是依然没有走出社会结构概念思路上的二元困境:在宏观与微观的对立中偏向于宏观,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中偏向于客体,在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中偏向于社会,在行动与结构的对立中偏向于结构。意象结构理论的提出消解了理性建构起来的规则式或关系式的社会结构,把建构社会结构的基础引到人类的知识和身体存在的本体论深度。身体和身体的存在成为社会结构生产、再生产和转换的中心,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共同嵌入身体的社会行动中并再现了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理论思想上,意象结构引领我们“走出‘结构’与‘行动’无结果的对抗以及作为这种对抗真实原因的相互误解”^{[2]156},还原了行动和结构在社会学分析中所扮演的角色。意象结构不仅是作为与制度结构、关系结构的第三种存在形式,并且是对这种学术分类体系的超越。它包含着制度要素和关系要素,同时将这些要素融合于集体化的心理结构中,并通过个体行动表现出来。正是意象结构,才使社会结构从宏观的、客观的和结构的制约性的走向与微观的、主观的和能动性有机的融合。

(下转第89页)

参考文献:

- [1][澳]马尔科姆·沃特斯. 现代社会学理论[M]. 杨善华,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2][英]杰西·佩洛兹, 约翰·斯科特. 社会结构[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 [3]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C].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5]周怡. 社会结构: 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 社会学研究, 2003(3).
- [6]贾春增. 外国社会学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7][英]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 李猛,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责任编辑: 贺长元

Embodied Structure in Modern Sociology

GU Hu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1, Anhui, China)

Abstract: Social structure only contain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relational structure in classic sociology theory. On the course of melting antinom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acroscopical and microscopical, Modern sociology advances a new type structure; embodied structure, which bring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basis into the ontological depth of existence of human knowledge and body. It is beyond the academic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makes social structure organic integrated from macroscopic, objective and structural conditionality to microscopic, subjective and social activity.

Key words: modern sociology;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relational structure; embodied structure